



# Vietnamese Bride: Folk Self - Regulation in Disorder

Li Dairong, Fu Zhifei

Third Postgraduate Team,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of China, Langfang, China

**Email address:**

506750789@qq.com (Li Dairong)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Dai Rong, Fu Zhi Fei. Vietnamese Bride: Folk Self - Regulation in Disorder. *Science Innovation*. Vol. 6, No. 5, 2018, pp. 276-279.

doi: 10.11648/j.si.20180605.15

**Received:** November 5, 2018; **Accepted:** December 4, 2018; **Published:** December 12, 2018

**Abstract:** Among the illegal immigrant groups in China, the Vietnamese bride is a focus of civil society, and to some extent, it also promotes the academia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e governance of civil society order. This paper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self-regulation, analyzed the root cause of the specific needs of Vietnamese brides, discussed the issues involved in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 of China triggered by Vietnamese brides, and provided a perspective for China's fledgling immigration management, a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overnance idea. The phenomenon of Vietnamese brides spawned by civil self-regulation involves crime and population security. This disorderly folk self-regul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needs of the bottom of society, which requires the state to intervene actively to restore the social order to an orderly state. The idea of intervention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e concrete and micro-level, the internal law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then based o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the re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open policy should be expanded as a platform,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s a guide, so a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stability and order of social order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Keywor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llegal Immigrant, Vietnamese Bride, Self-Regulation

---

## 越南新娘：失序的民间自我调节

李代荣，伏智飞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研究生部三队，廊坊，中国

**邮箱**

506750789@qq.com（李代荣）

**摘要：**在中国的非法移民群体中，越南新娘是一个民间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界对民间社会秩序治理的深层次思考。以民间自我调节的角度进行解析，对迎娶越南新娘的具体个人的需求加以根源性分析，以探讨越南新娘触发中国非传统安全领域涉及的问题，为中国刚起步的移民管理工作提供一个视角，作为实践治理的理论参考和思路。民间自我调节催生的越南新娘现象，牵涉犯罪领域和人口安全领域。这种无序的民间自我调节，是社会底层需求遭遇阻断所催发的结果，需要国家加以积极的干预，使社会秩序回归有序状态。进行干预的思路，应从具体微观层面考察，认识内在规律，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准确把握社会秩序安定有序与民间需求得到满足的辩证统一关系。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非法移民，越南新娘，自我调节

---

## 1. 引言

在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方面, 非传统安全领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至今为止, 非传统安全领域仍然没有非常确切的概念, 更没有确切的范围。总体而言, 凡是因非军事原因对国家、对国际社会形成大规模损害和战略性损害的, 都可以用这个词。[1]非法移民问题, 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又未能妥善处置的问题, 成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内不可忽视的问题, 足以影响国计民生和引起国家内外政策、法律法规的调整。2018年4月2日,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举行挂牌仪式, 在其职责规定中正式出现了“非法移民”的表述, 在此之前, 均称之为“三非”外国人, 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这也标志中国对移民的管理, 尤其是对国内的移民管理正式上升至国家政策层面。在中国的非非法移民中, 越南新娘是一个特殊群体, 也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越南新娘一词现在已成专属词汇, 包括两类群体: 一类是通过合法程序与中国男性公民取得合法婚姻资格并取得中国国籍的越南女性; 另一类则是非法进入中国居留未能与中国男性公民取得合法婚姻资格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不具有中国国籍的越南女性, 即非法移民。这类群体, 绝大多数散落或小范围聚集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2]这类群体无疑是民间自我调节的结果。为论述方便, 本文所指越南新娘限定为非法入境(包括被拐卖的妇女)到中国境内与中国农村男性公民未取得合法婚姻资格与之以夫妻名义生活但不具有中国国籍的越南籍女性。

## 2. 症结

从这类群体的行为上看, 她们违反了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婚姻、劳动等法律法规。从法律的角度上说, 她们是应当受到谴责。她们的进入, 势必会引起社群内的资源(如土地资源)和关系调整, 从而引发纠纷。而且, 与越南新娘组建的家庭不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之下, 由此埋下了更多后续家庭和社会的隐患。然而, 这种跨境非法婚姻可能催生的拐卖妇女等跨境犯罪中, 她们是被害人, 身心受到强烈打击, 从这个角度上说, 她们无疑是值得同情和关心的。虽然不尽是每名越南新娘都会有此遭遇, 但是这个群体的存在, 无疑增加了发案的可能性。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约有6.5万名越南新娘。[3]实际数量应会远大于此, 但是出于论述的严谨要求, 再没有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无法作更精确的表述。越南新娘在中国的出现, 是两国民众应对失衡社会状态的自我调节。对于民间需求和供给的自我调节, 应当予以支持和鼓励, 社会才会有蓬勃发展的活力。前提是这种民间自我调节是、有序的、无损于他人和社会的。毫无疑问, 越南新娘群体是一种已经失序的民间自我调节。民间的自我调节具有无序的特性, 而无序的调节有时会带来暂时的平衡, 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罪恶。[4]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公布的刑事案件以“越南”“拐卖妇女”为关键字进行检索统计, 2016年判决96起、涉及被拐卖越南妇女313人; 2017年判决112起、涉及被拐卖越南妇女384人, 2018年1月1日至6月30日判决

48起、涉及被拐卖越南妇女106人。[5]在所有犯罪中, 拐卖妇女儿童无疑是最为践踏人权的犯罪之一。

## 3. 原因

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创造了需求, 现代凯恩斯经济理论则认为需求导致了供给, 双方无法说服彼此。在越南新娘这个问题上, 我们同样无法考证究竟是哪个主导了对方。诚然, 用经济学理论类比社会问题不太恰当,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现今而言对于越南新娘这个群体来说, 需求和供给是互为因果的。

### 3.1. 拥有稳固的性生活

尽管马斯洛阐述的需求层次理论并不能取得普遍认同, 但是生理需求对于人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原始推动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 那些相对贫穷的男性往往不易在熟悉的社群环境内娶妻, 尤其是在农村中。但作为具备完整生殖能力的男性, 出于本能和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 他们更渴望拥有稳固的性生活。而中国将性交易列为违法行为, 对于稳固性生活的需求和非法性交易的资金成本、道德成本、法律成本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他们已经被“熟人的社会”[6]的道德传统和法律的强制力阻断了性生活和繁衍的权力。那么只能另寻它法, 如此花上几百几千乃至几万块钱能娶得一个陌生的越南新娘无疑是一件能令人接受的事。至于采取偷情或手淫等其他非正常渠道解决性生活, 即是“非正常”那么终究不是稳固可靠的方式。社会底层的男子性生活没有保障, 也没有任何组织有义务为其张罗和解决, 那么他们进行自我调节也是顺理成章的现象。

### 3.2. 传宗接代的意念

结婚不是私事, 生孩子也是一项社会分子的天职。[7]生育是为了完整的社会分工得以有序的延绵, 传宗接代不止是个人为了老有所养, 死后有人上坟, 更是社会运行过程中赋予个人捆绑个人一生的一项义务, 并且这项义务并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有所降低其影响力。亚里士多德说, 人类是天生社会性动物。在分工体系比较复杂的社区里, 一个人如果死了, 社会上与之生活相关的人还需要顺利活下去, 就需要有人替代他的角色行使他的社会任务, 那么接替他的位置的, 无疑是他的后代最为适宜。我们可以体会, 上世纪80年代从欧美流传入中国的“丁克族”观念, 也仅仅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双职业夫妻群体中引起一阵热闹和效仿, 但随后能坚持到终老的十不存一。在以孝为先的传统国度里, 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群体尚且如此, 那些一直秉承“无后为大”的传统农村男性对生育后代的渴望可想而知有多强烈。如此, 对于本身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男性, 假若无法在熟悉的环境中顺利娶妻生子, 那么能顺利迎娶一个外来的长相无甚差异的女性, 哪怕这个女子是离异的甚至身体有缺陷的, 只要能与之配合完成传宗接代的社会义务, 不管这个女子是被骗来的、拐来的还是绑来的, 为此付出一定的金钱也是值得的, 即使为此去借贷。

### 3.3. 趋利避害的选择

越南女性给人们的总体感观印象是辛勤无怨吃苦耐劳的形象。“越南人的敏感，体现在能非常精确地理解我们的敏感，决不使自己和对方有丝毫的难堪。”[8]越南女性行动上的品质和性格上的体贴，也正符合了中国传统农村男性的择偶标准。而越南国内女性地位低下，加上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南女子想通过婚配的方式谋求更好的生活。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总人口数为13900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数41.48%、城镇人口数占58.52%；男性总人数71137万人、女性总人数67871万人，男性比女性多出约3266万人。[9]虽然该公报未再对人口分布情况公布更为具体的数据，但以此作参考可知，中国农村男性比女性多出的总体数量依然十分庞大，男性的婚配缺口同样十分庞大。因此，越南新娘的到来，对于不易在熟人的社会里娶妻生子的中国传统农村男性完成其最基本的社会任务，是双方趋利避害的个体理性选择。

### 3.4. 民不举则官不究

对越南新娘采取“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是政府各相关的基层职能部门的普遍共识。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完备的今天，法律也不是解决农村纠纷问题最有效、最合适的手段。习俗，仍然是解决大多数农村纠纷的可行方法。“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对鸳鸯”更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美好心里期盼，虽然“鸯”来自异国，但是品种并未变异。可以想象，如果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在下乡工作的时候自己发现一户村民家中勤劳耕作安心生活，不惹事不闹事的越南新娘是非法移民，把她拘留审查遣送出境，他们将面对村民们怎么样的道德谴责，今后他们的工作将会遇到村民们怎么样的阻力。相反的，即使是这个娶了越南新娘的男人和村里人产生了纠纷，被村里人举报了，村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是会有共识地采取“和稀泥”的方法，安抚举报人，教育被举报人，囫圇着把越南新娘的事情揭过去。至于如此处理方式的达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好还是坏，则无法给予清晰地界定。

### 3.5. 乡民基于同情不举报

在中国的农村传统中，纠纷最激烈，骂人最恶毒的话莫过于咒人断子绝孙。骂人断子绝孙，意味着咒人老无所养所依，意味着咒人死后无人安葬上香。一般没有深仇大恨，都不会这么咒骂。同情弱者，是村民们的普遍心里共识：“人家倾家荡产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媳妇，举报她使她被赶走了，那不是害得人家断子绝孙吗？日后我还如何在村里生活？会被人戳脊梁骨的！”农村人对事实评价的标准要求，远远不及对道德评价的标注要求来得重要。事实不清，可以糊涂着过，道德不清，就意味着被整个群体所孤立。

### 3.6. 执法者的道德考量

中国民间社会对与有同样文化渊源且无明显生理差异的越南新娘融入社群具有很强的认同感，越南新娘也是

如此。除却骗婚的之外，越南新娘能很快的融入家庭及社群生活，并且不为其他人所歧视。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且是和睦且安于清贫的家庭，若因为妻子、儿媳、母亲是非法移民而受到处罚且遣返回国，打破了一个家庭的完整，打碎了他们对生活的期许，虽然法律确实如此规定，但这无疑是民间道德对执法者乃至法律的一次沉重拷问。因此，是发现一个依法处理一个，还是发现了当作没有看见，对于执法人员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 4. 干预

从微观层面考察，执法者道德上的考量和客观上发现、处置的困难，促使了中国当前对越南新娘采取默认的态度；从宏观方面考察，总体适婚人口比例失衡，造就了越南新娘数量的扩张。综合分析，国家与民间对待越南新娘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当国家的政策、法律与民间的需求不一致，自然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不难发现，政策、法律的强制执行，虽然利弊宣传深入了各家各户，但依然引起了民间的强力反抗。在此并非否定计划生育政策，而是仅仅就政策引起的社会问题而言。

对于非法移民问题，世界各国采取的普遍做法是防、堵、疏结合。防，是在边境线上实施物理隔离，加上巡逻防控和发动群众参与的方式，用以防止外国人非法入境；堵，是在沿边沿海地区通往国内腹地的各主要交通要道设置检查站进行查控，用以及时发现非法入境的外国人然后予以处置；疏，对已经成为非法移民事实群体的处置。防和堵，没有任何值得争议之处，因为无论如何严密，都无法杜绝非法入境的现象，只能是在方式和力度上随着国家的政策变动而有所加紧或放宽。疏，才是考量一个国家处置非法移民的能力和智慧指标。应该清醒地看清，这种民间自我调节带来的稳定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其在上所引发的弊端则是广泛和绝对的，国家必须予以积极干预。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的对其国内的非法移民发现后予以全部遣返。当中的原因不乏人道主义的因素，但是非法移民对其国内民间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有一定益处才是真正根源性原因。从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组建预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制定出台关于移民治理的专门配套法律。因此，本文旨在为中国刚起步的移民管理工作提供一个视角，作为实践治理的理论参考和思路。越南新娘这种无序的民间自我调节，是中国社会底层需求遭遇阻断所催发的结果，需要国家加以积极的干预，使社会秩序回归有序状态。进行干预的思路，应从具体微观层面考察，认识内在规律，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准确把握社会秩序安定有序与民间需求得到满足的辩证统一关系。

### 4.1. 自产和引优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的人口发展情势颇为严峻，以自产方法平衡性别比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战略难

题,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国家职能部门要予以正面的宣传引导和政策鼓励。城市化和城镇化是发展方向,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化过程还是一个欲望张扬的过程,同时又是女性择偶更加挑剔的过程。[10]传统的底层男性在熟人的社会婚配遇到困难时,可以参考国家人才引进策略,以婚嫁为直接目的导向,面向其他国家(地区),以磋商协议的方式,给予政策便利,鼓励他国民间有一定文化素养和体魄强健的优质女性进入我国。需要注意的是,防止以骗取国籍为目的而实施其他行为的审查。

#### 4.2. 有区别的全面清理整治

随着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组建,可预测中国的非法移民这个庞大而琐碎的工程将会得到系统的处置。需要注意的是对此类群体在我国的作用、价值区分。不能单纯的使用一刀切的做法,以免引起民间怨气,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譬如,对于已稳固安家生活并承诺放弃原国籍的群体,可与对方国家职能部门磋商,将个体整合成集体集中起来限期办理完结法律手续,对于因个人原因未能在期限内办结手续的,尤其是那些不能给社会创造财富,只消耗社会公共资源,影响社会秩序的群体应当坚决遣返。此项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无疑是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在统计登记过程中,需要对群众,尤其是与此类群体有利害关系的群众,将法律政策讲解透彻,使其能清晰辨别利弊得失,让群众从被动配合变为主动参与。

#### 4.3. 把好入口关卡

必须客观的承认,在防止非法入境工作中,防控工作再精细都难免有疏漏。因此,在国家专门力量防控的基础上做好边境地区他国边民入境务工的关口尤为重要。譬如,在中国云南、广西边境地区甘蔗收割季节,对种植户聘用越南务工人员的管理,应做到逐人登记、行踪明晰、工结人返,坚决防止此类群体往我国内地继续深入非法务工,继而形成非法居留、非法移民群体;对于国家腹地需要大量低端技术工人的流水线工厂,应当加强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并向社会公告,形成威慑。

#### 4.4. 做好宣传讲解

法律、政策的施行,只有深入到群众心中,使群众明白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使群众有主动配合、支持、参与,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没有群众支持的规则,则失去了执行的基点,更无从谈及成功贯彻的可能。因此,在基层基础工作中,各职能部门应当联动起来,对群众宣传讲解国家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决心,以及未经婚前体检的涉外非法通婚带来的风险和后续弊端,真正让群众能自己权衡得出涉外非法通婚的利弊得失。

## 5. 结语

作为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群体,现今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11]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这个规模最大的阶层更应当被以居安思危的心态引起关注,他们当中难以在规范的社会秩序中婚配的人群以民间自我调节的方式迎娶了越南新娘,引起了社会秩序失范,给社会安定埋下了诸多隐患。因此,处理好中国的越南新娘及因其衍生的群体问题,不仅仅是应对非法移民领域内的分工,而是一个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实际执行都能合乎社会需求,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使一种失序的社会现象回归到有序状态,维护好国家的安全稳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迈出最底层、最基础的一步。

## 参考文献

- [1] 孙小迎.母殇-国家安全发展中的妇女儿童问题[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5。
- [2] 管成云,冯强.商品化婚姻与中国农村光棍游猎式相亲的婚姻风险——基于“越南新娘”报道(2010-2016)的内容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11):62。
- [3] 武艳华,陈海萍.无利不媒:中越跨国婚姻婚介者的行动逻辑[J].人口与社会.2017,(3):104-114。
- [4] 孙小迎,李碧华.关于反对跨境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的调研报告[J].东南亚纵横.2006,(12):31。
- [5] 中国裁判文书网[Z].<http://wenshu.court.gov.cn>.2018:11。
- [6]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刷馆,2011:9。
- [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刷馆,2011:312。
- [8] 蒋子龙.越南人的性格[J].党建.2007,(10):63。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2018:2。
- [10] 孙小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威胁国家安全发展[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9):13。
- [11]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7-19。